

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·奋力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

德江土家族炸龙，一种朴素的发展哲学

张江林

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、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。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，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，推进文化自信自强。”保护好、传承好、发展好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对于赓续中华文脉、坚定文化自信，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。

德江土家族炸龙源于明代“舞龙求雨”的祭祀活动，历经六百余载传承，已从单纯的酬神仪式演变为一场全民参与的民俗盛宴。2021年，跻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，标志着其文化价值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。然而，比“申遗”成功更值得关注的是，其作为一项民俗实践，是如何突破许多非遗项目“博物馆化”或“传承危机”的困境，真正活态地、深度地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。它的传承与发展不仅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核心要义，而且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提供了富有启示的实践路径。

一、从“非遗项目”到“生活日常”，体现生命活力

马克思恩格斯在《神圣家族》指出“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，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，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”。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，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。德江土家炸龙源于明代“舞龙求雨”的生产生活实践，历经六百余年，其形式、内涵在不断丰富与演变，但始终由群众自发推动，成为一种“血脉的召唤”和自觉的文化实践。一是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。从资金自筹、龙灯自制到全民共舞、万人同欢，每一个环节都是群众自发组织、参与。这种扎根于人民、由人民主导的文化实践，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具有了最广泛、最坚实的群众基础。二是始终与生产生活紧密相连。从每一年“群龙”沿街巡游所展示的主题来看，都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，让非遗从一种需要被保护和展示的“文化遗产”，回归为一种源于生活、属于生活、服务生活的“文化实践”。这种强烈的归属感是文化得以深度融入生活日常、标新立异、巡游展示时，不仅有千姿百态的“龙”，还有彩车、长号、土家摆手舞乃至以传统故事为题材的“亭子”方队，都想在老百姓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有强烈的竞争意识。但是一到“舞”和“炸”的过程，大家就不分地域、不分民族、不分老幼、不分你我地全情参与，这时没有输赢，只有激情的狂欢。这是一种在欢乐气氛中

进行的程序规范的仪式，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共同体。

二、从“年节仪式”到“经济红利”，激活内生动力

马克思主义认为，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由经济基础决定，并能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。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流动与创造价值。德江土家炸龙巧妙地将其巨大的文化吸引力转化为切实的经济效益，形成了“以文促旅、以旅彰文”的良性循环。由于经济利益的内生驱动，保护与传承成为社区民众自觉的、可持续的日常行动。一方面，活动本身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。近年来，德江积极探索“非遗+旅游”发展模式，不再让舞龙、炸龙局限于短暂的元宵节。依托“炸龙”这一非遗项目，大力发展“节庆经济”，每年元宵节期间，数万名省内外游客、摄影爱好者涌入德江，带动了餐饮、住宿等行业爆发式增长。同时，围绕炸龙IP，衍生出爆面具制作、土家织锦等非遗工坊的线上销售，仅2026年春节期間相关线上销售额已突破50万元。这意味着，炸龙文化已渗透到日常的审美消费和创意经济中。其通过文创产品、线上体验、常态化展演等方式，转化为日常生活中可触摸、可购买、可分享的“文化符号”和“生活方式”。另一方面，炸龙活动作为强大的文化纽带，重塑和强化了街道社区内部与外部的社会联系，打破了现代生活中可能存在的疏离感，促进了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，增进了相互理解和尊重。这种文化实践通过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、协调社会关系，有效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，体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反作用。

三、从“技艺传承”到“情感相亲”，凸显文化张力

德江土家炸龙历经六百余年，其竹编技艺与爆破奇观日臻成熟。今天，这项狂野的非遗正在“火”进现代人的生活。探究其从冷冰冰的“技艺传承”到温暖融融的“情感相亲”跨越。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。一是开放式的技艺传承。从破竹蔑、扎龙头到编草龙，德江炸龙融合了竹编、绘画、剪纸等传统工艺。传承的难度是很大的，但这么多年来，这门技艺从没有故步自封，主动打破传统的“父子兵”“兄弟连”的说法，只要喜欢就可以参与进来。如今，是通过“非遗进校园”，让越来越多的“90后”“00后”接过接力棒。他们不仅学会了扎龙的“手艺”，更将现代的审美与创新融入其中，让这条“火龙”在新时代更加凸显其魅力。二是火花里的情感相亲。在炸龙过程中，舞者赤膊上阵，头戴护具，在密集如雨的鞭炮和噓花中穿梭翻腾，这绝不是一场单纯的感官刺

激，而是一次深度的“情感相亲”。在那一刻，舞者与围观者、邻里与乡亲，通过“炸”这种独特的方式打破了现代社会的社交壁垒。大家在烟火熏燎中欢呼呐喊，共同宣泄着情感，释放着生活的压力，将个体的喜怒哀乐汇聚成集体的共鸣，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。三是野蛮生长的文化张力。“龙身炸得越烂，来年年景就会越好。”在这句朴素的民谚背后，隐藏着土家儿女不畏艰险、奋勇争先的民族风骨。它粗犷、豪放，甚至带着一丝原始的冲动，却恰恰填补了现代人内心深处对“极致体验”的渴望。它不仅吸引了本地人的全员参与，更让无数外地游客慕名而来，甘愿沉浸在这片火光与呐喊的海洋中。它已经不再仅仅是土家族的专属记忆，而是成为了一张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名片，生动地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与包容。

四、从“单一民俗”到“文化IP”，拓展品牌魅力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，既需要薪火相传、代代守护，更需要与时俱进、勇于创新。”德江土家炸龙虽具鲜明的土家族特色，但其核心——龙崇拜，是贯穿中华文明的精神图腾。其在传承过程中不仅与时俱进地增加现代性科技成果，而且特别注重吸纳其他民族的元素。因此，它既是本民族智慧的结晶，也与更广域的中华民俗文化血脉相通。这种“各民族文化相通”的特质，使得炸龙超越了单一民族的范畴，成为能被各族群众欣赏、参与的文化盛事。如何进一步拓展其品牌魅力，通过与现代科技（如AR/VR）融合，让老民俗焕发新时尚，还需从三个方面发力。一是要讲透其背后的原生态土家哲学和历史厚度。炸龙的灵魂不在于“龙”本身，而在于千千万万普通土家儿女在火光中迸发的生命力。因此，要鼓励当地群众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内容共创，比如举办“民间扎龙创意大赛”、征集年轻人的“炸龙短视频，让老百姓自己讲故事，IP才具有不可复制的生命力和感染力。二是要回应“美好生活需要”。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，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期待越来越高。炸龙不能只停留在“博眼球”的火药味上，更要直击现代人的心理需求。在挖掘其“驱邪纳吉、迎难而上”精神内核时，须将其与当代人释放生活压力、祈求美好未来的心理诉求相结合。当IP能抚慰人心、提供情绪价值时，它就超越了地域限制，成为各族群众都能共情的“精神加油站”。三是要贯彻“成果由人民共享”理念。马克思主义认为，文化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。以IP为核心，发展“非遗+旅游”“非遗+文创”产业链。开发炸龙盲盒、潮玩、开办炸

龙主题民宿，让游客沉浸式体验，让群众平等自主参与经营，当群众发现“舞龙不仅能传承文化，还能赚钱”时，他们的自豪感和积极性将被彻底点燃。这种充满烟火气和致富希望的IP，具有最质朴也最强大的吸引力。

五、从“民间习俗”到“治理样本”，创新共治合力

德江土家炸龙从一项带有“野性”的民间习俗，成功转型为全国知名的文旅IP和基层治理样本，其背后正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生动实践。我们可以从三个核心维度来拆解这场“创新共治”。一是注重文化浸润与精神陶冶。炸龙活动创新了传承模式，如将非遗融入校园教育、通过“篇章体”巡游重构文化叙事、利用现代科技拓宽传播路径等。这让传统文化从静态展品转变为“流动的、活态的文化叙事”，其生命力源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转化。二是注重问计于民与治理创新。由于炸龙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危险性，2009年，县里出于安全和对新建城市设施的保护考虑，决定调整舞龙炸龙线路，导致群众不满与执勤民警发生冲突。之后，党委政府经过多方走访，问计于民，深刻认识到，丢掉群众这个主体，习俗就失去了灵魂。随后，通过搭建多元议事平台，让群众自己商量“怎么炸、在哪炸、如何守规矩”。这种身份的转变，不仅保留了炸龙最原汁原味的狂欢底色，更让文化习俗在现代社会中重新焕发了生机。三是注重“民俗传承”与“协同治理”的双向奔赴。按照“协会主办、群众参与、政府服务、安全和谐”的原则。社区干部深入走访，收集群众智慧，划定燃放区域、规定时间节点。组建由民警、消防员和“龙灯志愿者”构成的联防队伍，让群众力量融入专业安保。政府通过数字化管理手段，如人流监测系统和应急广播，确保活动安全有序。这种“政府服务”并非大包大揽，而是为民间自发的文化热情提供安全保障和秩序框架。政府划定17个集中燃放点，既保留了民俗的野性与激情，又守住了安全的底线，构建起了“社会主办、政府护航、全民共享”的良性治理生态，不仅让传统的民俗活动能够在现代城市管理中健康、规范地开展，而且让古老的民俗在现代社会找到落脚点。这不仅是文化遗产的复兴，更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张闪亮名片！

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视角审视，德江土家族炸龙充分挖掘、活化利用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，使其在当代生活中绽放新的光彩，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、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的强大力量。

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“推进乡村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，加强乡村文物、传统村落、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保护”。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的鲜活载体，推进乡村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，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内容。非遗石阡说春于2016年随“二十四节气”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》，十年多来，其发展正经历着从“立春报岁”的节令仪式向“四季常春”的文化习俗的深刻转变。

从农事指南到文化遗产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，文化遗产是社会发展进步中一种既得的生产力，“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、资金和生产力”进行创造。石阡说春源于唐代、盛于明清，是春官在立春时节走村串户、以说唱形式派送春贴，传递农时节令与新春祝福的古老习俗，其所承载的农耕知识、节气经验，正是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的智慧结晶。在今天的乡村语境中，依然发挥着赋能农事、凝聚认同、涵养乡风等多重功能。一是指导农业生产。春官以春贴传节气、春词劝农耕，将二十四节气转化为村民听得懂、记得住的农事指南，村民们听闻春官唱词便知道什么时候该进行哪些农事准备，这种口头传递的农时经验，至今仍在指导人们备耕生产。二是凝聚文化认同。春官走村串户，不同民族的村民在共同聆听、相互应答中强化情感联结。说春词句里的侗语、苗语、土家语汇就是生动印证。三是涵养乡风文明。春词中蕴含的传统美德，通过口传心授融入乡村日常生活，发挥着以文化人的作用。春词中孝亲、勤俭、向善等内容，寓于韵律之中潜移默化。2026年说春大赛更融入移风易俗新内容，使说春成为涵化乡风、凝聚人心的有效载体。四是彰显文化自信。2016年，“二十四节气”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，石阡说春是该项目最具代表性的扩展名录之一。这一国际认可，既是对说春所承载的“敬天惜时”宇宙观的权威肯定，也为世界理解中华农耕文明提供了生动样本，是彰显文化自信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具体实践。

从薪火相传到创新实践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“要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，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，赋予新的时代内涵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。”石阡说春在今天的实践中，形成了以家族为根基、以校园为补充、以赛会为激励、以开放交流为拓展的四位一体传承创新体系。一是以家族传承筑牢根基，确保了技艺在实践中的深度延续。比如：坡背村封氏家族自唐代世袭春官之职，千年不断，至今该村800多人中近一半男子会说春，大部分家庭两代乃至三代掌握技艺，参与说春实践。二是以校园教学培育代际新苗。主动将说春引入校园，编写地方教材，开设兴趣班。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每周在当地中小学授课，已成功培养数百名青少年传承人。三是以赛会展示激发参与热情。2026年3月，石阡举办“春官传韵·兴农春耕”说春大赛，数十名选手同台竞技，涵盖老中青幼四代，赛事设置鞭春、打春牛、刷春贴等环节，完整还原传统仪式，有效激活内生传承动力。四是以开放姿态推动文化传播。2026年3月，30余名贵州师范大学国际学生应邀身着春官服饰加入说春巡游方阵，用中英双语喊唱祝福。同年贵州“村晚”舞台上，传统说春调与现代Rap混搭，引来掌声雷动。这些活动激发社会关注，让古老民俗获得了跨文化对话的新可能。

从文化习俗到活态传承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“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”，强调“推动高质量发展，文化是重要支点”。石阡说春要真正实现从“立春报岁”的节令仪式向“四季常春”的文化习俗的转变，关键在于让非遗深度嵌入生产生活，在保护与发展中构建常态化运行机制。一是变节庆活动为全年运营。将说春结合传统节日节庆拓展为全年系列活动，打造“‘春茶、夏水、秋石、冬泉’‘季季有主题，月月有活动’”的文旅格局。二是以内涵活化增强时代适配。传承人历来坚持词可微调，魂不能改，强调要传“活着的智慧”，在实践中剥离已不合时宜的内容，保留农耕文明核心价值。根据需要编写主题“春词”，如《防电信诈骗春词》《喜迎党的二十大春词》等，运用传统形式传播时代新声音，创新而不失本味，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。三是以活态传承赋能乡村振兴。活态传承是指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过程当中进行传承与发展。在石阡，说春比赛营造了全民参与的氛围，非遗工坊、民俗体验等业态随之兴起，古老的唱词转化为村民增收的现实路径。从田间地头到“村晚”舞台，从家族传承到文旅产业，石阡说春在保护与发展找到了活化传承的出路，为少数民族地区非遗传承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。

从『立春报岁』到『四季常春』

丁染

传承文化遗产

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：“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既要保护有形的村落、民居、特色建筑风貌，传承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又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”深入为少数民族非遗活态传承、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。思南花灯戏作为乌江流域农耕文明孕育的民间戏剧艺术，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是承载民族记忆、联结乡土社会的重要文化载体。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，如何破解传承困境、推动其创新转化，实现文化遗产与乡村发展同频共振，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。

在实践活动中培育传承力量。马克思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指出，思想观念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，与人们的物质交往，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。这充分说明，文化传承并非简单的知识传递，而是植根于物质生产实践、在社会交往中生成的动态过程。思南花灯戏源于土家族群众生产生活实践，其核心技艺与文化认同，始终依托口传心授、同台演绎的实践场景完成代际传递，而非课堂化、书本化的单向灌输。伴随城镇化进程加

快，农村人口外流、传统演出场景萎缩，花灯戏面临实践场域消解、传承主体断层的现实矛盾，这是制约其活态传承的根本困境。立足群众史观，思南县创新构建传承体系。一方面，夯实青少年传承基础，将花灯操纳入全县246所学校大课间活动，以常态化实践实现文化浸润。依托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进校园授课、专题培训24期，培训3000余人次，破解技艺传承专业化不足问题。另一方面，厚植民间传承土壤，依托全县百余支业余花灯队日常演出，让传承回归社区、回归乡土、回归生活。春节期间，年轻一代跟随老艺人走村串户、实地演出，在唱腔练习、身段演绎、临场应对的共同实践中，接受观众检验、积累实战经验。这种以老带新、以演促学的传承模式，在社会实践中实现技艺传递、情感联结与认同建构，完成从“老辈坚守”到“后继接力”的主体性转换，为花灯戏传承筑牢人才根基。

在群体参与中凝聚文化共识。“不是意识决定生活，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”这一基本原理表明，传统文化的生命力，不在于静态保护与名录记载，而在于持续嵌入群众日常生活、服务现实生活需要。在农闲时的排练、院坝里的自

赋能乡村振兴

李姝雯

娱、走村串户的交流，让花灯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，实现从“被动观赏”到“主动参与”的转变。一是构建常态化公共文化空间。以“中国花灯戏传统村落”金龙村为示范，组建老、中、青三代花灯戏队伍，坚持每月定期排练原创剧目；依托文化科技卫生“三下乡”等载体，推动花灯戏走进乡镇村寨，让花灯戏从“过场大戏”逐步走向群众身边。二是激活群众参与主体性，通过乡村春晚、民俗健身赛事等平台，实现“群众演、群众看、群众乐”，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、创造者。2025年，全县28个乡镇（街道）组队参与花灯赛事，以竞赛提升演艺水平，以参与满足精神文化需求。从节庆仪式到日常实践，让非遗回归生活、扎根群众，在常态化参与中凝聚乡村精神、维系乡土纽带，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的文化凝聚力。

在价值转化中激活内生动力。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由经济基础决定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，传统文化能够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。思南花灯戏作为成熟的文化实践形态，其传承发展不仅具有精神文化价值，更能通过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转化为乡村经济发展、民生改善的

现实动能。一是做强文旅融合核心引擎，2025年国庆中秋双节期间，以花灯戏非遗为核心打造“花灯璀璨·双节同庆”文旅嘉年华，吸引省内外大量游客奔赴思南，让花灯戏从节庆点升级为文旅核心IP。二是延伸文创产业链条，融合土家剪纸与花灯戏非遗内核，融合特色视觉元素，开发团扇、冰箱贴、伴手礼等文创产品，以市场化手段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。三是培育研学新业态，打造非遗研学基地，开设非遗等特色课程，自运营以来累计承接学生6万余人次，以沉浸式体验拓宽传承路径、激活年轻群体市场。从文化实践到发展红利，是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良性循环，以文化赋能产业、以产业反哺传承，激活群众参与的内生动力，让非遗传承从文化责任转化为发展机遇，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与经济动能。

思南花灯戏的传承实践充分证明，唯有扎根群众生活、立足社会实践、推动其价值转化，才能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机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力量。